



抗战时期,它的演出占了“雾季公演”110多台大型话剧的近1/5;它上演的《大地回春》《屈原》等知名话剧轰动全国……

南岸苦竹林诞生的中国话剧奇迹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胡雁冰

抗战时期的重庆,由于日机狂轰滥炸,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。而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,经常大雾弥漫,阻挡了日机空袭。重庆文艺界就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演出,史称“雾季公演”。

从1941年至1945年,重庆“雾季公演”坚持了四届,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。

南岸黄桷垭(今南岸区南山街道联合村)苦竹林,虽名不见经传,但在20世纪40年代,这里诞生的一个组织,却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一炮而红

1941年春季,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时期。国民党顽固派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,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,同时还加紧对文化控制,不准电影工作者拍片。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,让人们噤若寒蝉。

当年夏秋之间,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出,“重庆近来像一座‘死城’,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,必须想个办法予以冲破。”

针对这种情况,戏剧界人士提出,等着挨打不是办法,要干、要演戏。

于是,郭沫若找来阳翰笙,传达周恩来的意见,“要利用国民党控制的文化机构和团体,把话剧这一武器夺过来,创立一家民营剧团。推动进步的戏剧运动。”

1940年4月,郭沫若、阳翰笙向周恩来建议修一座专门用于话剧演出的剧场。1941年4月,抗建堂竣工启用,这就有了演出场地的基础。1940年,宋之的编剧、应云卫导演的话剧《雾重庆》上演,成功的案例也有了。

阳翰笙问经费怎么办?郭沫若说这个不用担心,“周恩来同志批准拨付了3000元。”

阳翰笙又问有什么要求?郭沫若告诉他:一、组织一个企业剧团,演员不脱离原单位,生活上有保证。二、演出剧目,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,通过借古讽今、旁敲侧击的办法进行战斗。三、出面的领头人,既要听党的话,政治色彩又不能太浓;既要业务真正懂行,又要有组织活动的能力。

阳翰笙拟出初步方案,给剧团取名为“陪都戏剧之家”,并于1941年4月与陈鲤庭、陈白尘等人,经过一番“密谋”细化后,便开始行动。

首先是挑选出面的领头人。经过审慎研究,最后选中了应云卫。应云卫从事戏剧运动20多年,艺术上有水平、有经验、有才华。社会关系多、办法也多、敢于冒险犯难,还有一套对付恶势力的经验。他是公认的组织剧社的干才,由他出面最为合适。征求意见时,应云卫也欣然同意。

接着就是组建核心班子。由阳翰笙、应云卫等通过各种渠道,找来陈白尘、陈鲤庭(兼导演)、辛汉文(兼管艺委会)、刘裕民(兼剧务)、贺孟斧(兼导演)、孟君谋(兼总务)组成理事会,应云卫任理事长,陈白尘兼任秘书长。

社员有赵慧琛、秦怡、沈硕甫、苏绘等约20人,

连同其他工作人员,固定在剧社工作的不足30人。

对于人手不够的问题,他们也想好了办法:在演出时,特约官办团体的朋友来支援,比如白杨、舒绣文、顾而已、张瑞芳、金山等著名演员。

1941年5月,“陪都戏剧之家”在南岸黄桷垭苦竹林一所简易的民房正式成立。

1941年6月,剧团首演由剧作家许幸之根据世界名著《茶花女》改编的话剧《天长地久》,由应云卫导演、白杨主演,在国泰影剧院连演四场,引起轰动。

郭沫若也来看戏,结束后到后台同演员交流,“我连看两场过足了戏瘾,你们都是大牌,各有千秋。观众中有个群体特别惹人眼球,不知(你们)注意到没?”

大家诧异。原来,大街小巷的理发师对此剧很有兴趣,是想把剧中的时髦发型学到手,然后好借此赚钱。

于是,郭沫若把“理发师来坐满楼”写入题诗中,并提议将剧社更名为“中华剧艺社”,人们简称“中艺”。

1941年10月10日,《新华日报》刊发启事:“本报为纪念双十节及戏剧节,发行增刊合出一大张半,零售二角,订户不另加价,希各界读者注意为荷。”次日,“中艺”第一部戏《大地回春》公演,拉开了“雾季公演”的序幕。

《大地回春》是陈白尘编剧、应云卫导演的五幕话剧。演员有秦怡、路漫、顾而已、项堃、吴茵、施超等。秦怡和路漫轮流担任女主角,饰演一位父亲是民族资本家、丈夫是小学教师的少妇。《大地回春》公演后一炮而红。

2勉力前行

剧社的开办经费,用来购置道具、化妆等必需品后,已所剩无几。没演前,更是拮据,因为没有票房收入。剧社工作人员没有固定工资,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零花钱。剧社每天开两餐大锅饭,只有演出日才在夜间加一顿热汤面。

大家穷得买不起衣服,很多男演员没有衬裤,就用旧幕布剪来缝制。无论是演员、导演、编剧,还是一般的舞台工作人员,大家轮流值班,上街买菜、跑腿打杂、烧火煮饭。

白天经常有日本飞机来轰炸、骚扰。有一次,大家凑了十几块钱,买了几斤肉来打“牙祭”。可谁知刚把肉丢进锅里,空袭警报就响了,大家躲在一个废弃的小煤窑里,只听到外面“轰轰”

的炸弹爆炸声。等警报解除后,跑出来一看,煮肉的锅已被炸翻。



抗战时期话剧“四大名旦”合影,右起舒绣文、张瑞芳、白杨、秦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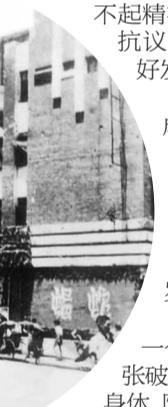
抗战时期重庆“雾季公演”



《大地回春》剧照



国泰影剧院



37岁的沈硕甫,在一个晚上倒在了街头。

张破席子裹着他枯瘦如柴的身体,除了外面一套为了撑门面的西装外,里面的衣裤破烂得如同乞丐。

“中艺”为沈硕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郭沫若走在队伍最前面,应云卫和陈白尘手执横幅紧随其后,应云卫年仅六岁的次子应大白手捧灵位充当孝子。因为,孤苦伶仃的沈硕甫身边没有一个亲人……

大家并没有被吓倒,仍然坚毅地生活着,乐观地战斗着。秦怡和熊辉无以抵御腹中的饥饿,便整日以唱歌为乐。秦怡说:“那些日子,‘中艺’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的阵地,我们抗战的武器,我们的艺术理想!”

3华丽奉献

演员们住的是陋室危房,吃的是粗粮,用的是浑浊的水,可是他们充满了真诚的友谊、乐观的情绪。

无论是“中艺”社员,还是特约演员,都有一种锲而不舍、刻苦钻研的劲头。为不断创造出美好的精神产品,为演出成功,大家都舍得花大气力、下大功夫。他们三天排一出三幕大戏、五天排一出五幕大戏,此外还担负着为附近学校义务排演、导演话剧的任务。

“中艺”社演出的第二个剧目是《天国春秋》,由阳翰笙编剧、应云卫导演。该剧无情鞭挞了韦昌辉搞阴谋破坏太平天国团结、导致革命失败的罪行,引起很大反响。每当剧中人洪宣娇说出“大敌当前,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”时,观众席上都会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《天国春秋》的上演,再次轰动了山城。但由于“中艺”社刚成立不久,政治环境险恶,

周恩来指示少对此剧作报道、作评论,充分相信群众的鉴赏力。

在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严密控制和层层审查下,郭沫若以借古鉴今的艺术手法,连续创作出《棠棣之花》《屈原》等慷慨悲歌的历史剧,形成持续性轰动效应,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1942年4月3日,《屈原》正式上演。陈鲤庭导演,金山、白杨、张瑞芳、顾而已、施超、孙坚白、张逸生等著名演员参演。演出又一次取得巨大成功。

为了感谢演员们的辛劳,郭沫若写了《十四绝·赠演员诸友》。周恩来为“中艺”举行庆祝晚会,并对该剧给予高度评价。

这时,“中艺”已从南岸迁移到重庆市中区,地址位于国泰大戏院(今和平电影院)附近。除继续演出上述剧目外,还演出《面子问题》(老舍编)、《忠王李秀成》(欧阳予倩编)、《长夜行》(于伶编)、《战斗的女性》(石凌鹤编)、《岁寒图》和《石达开》(陈白尘编)……

“中艺”的影响日益扩大,引起了国民党的百般刁难。1943年春,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,“中艺”转移到川西一带活动,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重庆。

在“雾季公演”中,“中艺”先后上演了夏衍的《愁城记》和《法西斯细菌》、曹禺的《北京人》和《家》、沈浮的《重庆24小时》等近20个优秀剧目,占了四届“雾季公演”28个剧社(团、队)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的近1/5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“中艺”以历史隐喻笔法,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,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、破坏团结的反动阴谋,对配合抗日民主运动和打击反动文化逆流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它将永远载入中国话剧史册。

4旧址寻踪

“中艺”旧址坐落在南岸黄桷垭苦竹林和尚窑,原是一座废弃的煤矿遗址。

旧址按川东民居风格修建,一楼一底,坐东朝西,三合院布局,土木结构。沧桑斑驳的墙面上,镌刻着被风霜雪雨冲刷后的痕迹。小青瓦,坡屋面、宽屋檐、挑梁上翘,宽敞的走廊,全靠五根粗壮圆木支撑着,层高约8米。在条石保坎上方,高耸着五间正房,左右两边各配有两个厢房,建筑面积有300多平方米,室内有吊顶。

周边绿树成荫,花木掩映,鸟语花香,四季常青,山涧溪水潺潺。特别是屋前那棵古老的黄葛树,枝繁叶茂,遮天蔽日。为演员们提供了遮阴纳凉的好去处。

剧社前边,是一块视野开阔的平坝,有600多平方米,是和尚窑倾倒煤矸石的地方,被打造成一个排练场。平坝下方有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小路,在小路右侧的土坎下,坐落着一排穿斗式木构架的旧瓦房,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。这排穿斗房,当年就是为解决剧社的编辑、导演、演员们居住而修建的。后来,房屋因开发建设而被拆除。